

历史视角中的『三农』

——王毓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李 军 王秀清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历史视角中的“三农”

——王毓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李 军 王秀清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视角中的“三农”：王毓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李军，王秀清主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109-12940-5

I. 历… II. ①李…②王… III. ①农业经济—中国—文集②农村经济—中国—文集③农民—问题—中国—文集
IV. F32-53 D422.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0441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白洪信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mm×960mm 1/16 印张：25 插页：2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4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与会人员合影



王毓瑚先生 1929 年在德国慕尼黑



王毓瑚先生 50 年代在罗道庄
北京农业大学校区



王毓瑚先生 1972 年手术后
在北京农业大学平房



1974年王毓瑚先生与夫人
在紫竹院公园



王毓瑚先生 1975年



王毓瑚先生 1975年在圆明园
遗址西洋楼前



1980年10月15日王毓瑚先生在北京农业大学小楼与胡道静、吴德铎夫妇及杨直民、董恺忱、詹玉荣、阎万英合影



1980年10月王毓瑚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农史会议

前 言

2007年12月22日是中国著名农史专家、经济史学家、农书目录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毓瑚（1907—1980）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纪念王毓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历史视角中的‘三农’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等驻京高校、科研单位的学者以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和王毓瑚先生的亲属、生前好友约5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为期一天，上午举行了纪念王先生的座谈会。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郭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秀清、图书馆馆长何秀荣、前馆长杨直民等高度评价了王毓瑚先生的生平事迹、人格风范；农史学界的专家董恺忱、李根蟠、闵宗殿等回顾了王先生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他们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推进农大农史学科的发展。王先生的哲嗣、陕西省社科院的王京阳研究员代表亲属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感谢。下午举办了以“历史视角中的三农”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历史与现实中的三农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内容涉及农业财政、农产品贸易、区域农业经济、农业技术、农业推广、荒政等各个方面，时间纵横古今，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既有传统史学的研究，也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方法的运

用，充分反映了农史学界研究的趋势。

研讨会结束后，决定出版纪念文集。纪念文集的编辑得到各位学者的响应，在会上发言的学者纷纷将其发言稿或文章整理发送过来，因故缺席本次会议的学者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关注。正是在众多学者的热忱帮助和大力支持下，纪念文集才得以顺利编撰完成。

按照会议的进程，纪念文集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是纪念性的文章，收录学者、亲属、友朋回顾王先生生平事迹、学术贡献的文章。下编收录学者们关于中外古今农业问题的论文，并按照内容和时间进行了分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所做文献注释、文章格式也存在差异，本文集保存原貌未做统一，同时希望这些体例能反映不同学科对农史研究的关注。书末收录了王毓瑚先生撰写的《略论中国古来农具的演变》一文，该文虽然在《王毓瑚论文集》中收录过，但当时未保存图片，为反映先生研究的原貌，本纪念文集将先生当年手绘的农具图片一并录入。

最后，我们对支持本次会议的方方面面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编 者

2008年7月

目 录

前言

上 编

高明独断 恢宏大度

——略谈王毓瑚先生的学术风格 李根蟠 (3)

深情怀念王毓瑚先生海人不倦、刻意求新的治学精神 杨直民 (9)

百年学术立尧功

——纪念王毓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历史视角中的“三农”

学术研讨会感言 徐旺生 (17)

王毓瑚先生校注之《王祯农书》解读

——纪念王毓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柴福珍 (19)

半个世纪的友谊：记陈士骅与王毓瑚教授 陈浩 陈瀚 陈沅 陈冲 (24)

真挚可贵的学者之谊 石定机 (28)

“高斋昼夜百瓴甌，劳身苦骨时砻砻”

——回忆先舅王毓瑚先生 齐傲 王琬 (30)

纪念大舅百年诞辰 齐曾荫 (34)

终生铭记伯父的恩情与教诲 王向阳 (40)

忆大爹 王莹 (42)

父亲永在我们心中 广阳 京阳 王盼 嵩阳 瀚阳 (47)

下 编

日本农法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兼论其在中国的回应与运用 董恺忱 (59)

印度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的比较 冯开文 (77)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群体居住特征形成原因及相关问题 徐旺生 (88)

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三农外

-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谈起…………… 王培华 (99)
- 我国农村集市的起源、分化与发展趋势…………… 武拉平 (114)
- 世界糖业发展史中的中国糖业：经济视角的评述…………… 司伟 (130)
- 国家与产权：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吕之望 (144)
- 中国新石器时期家猪的分布
- 基于考古资料的研究…………… 黄英伟 (161)
- 汉武帝集权经济政策体系的成功原因…………… 史向辉 宋擎擎 林万龙 (168)
- 元代诸色户计中农业人口政策及动态影响…………… 石华 (179)
- 元明佛教寺院农业问题初探
- 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 曹刚华 (194)
- 明清时期土地制度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范毅 (211)
- 政府与三农关系试探
- 以清代救灾为例…………… 江太新 (227)
- 晚清蚕桑推广的成效和问题…………… 闵宗殿 (244)
- 20 世纪 30 年代山东地区农业恐慌的历史分析
- 农作物种植结构视角的考察…………… 李军 (256)
- 国民政府的农业财政行为…………… 胡泽学 李三谋 (271)
- 近百年中国东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王秀清 李文明 (291)
- 斗鸡游戏和中国古代的养鸡科学技术发展…………… 汪子春 (320)
- 历史视角中的“三农”
- 纪念王毓瑚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
- 纪要…………… 李军 王秀清 (332)
- 略论中国古来农具的演变…………… 王毓瑚 遗稿 (337)



上 编

高明独断 恢宏大度

——略谈王毓瑚先生的学术风格

李根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农业科学》杂志工作，组织和处理农史方面的稿件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我从陈道先生处得知，王毓瑚先生正在撰写中国农业史方面的系列文章，为此我到北京农业大学拜访他。拜访的另一个目的是请教。当时我迫切需要在经历长期政治运动后把荒废的学业重新抓起来，跨进农史领域的门坎。要见这样一位蜚声中外的农史界的前辈学者，心情既是兴奋，又未免有点忐忑——王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王先生是在他的住房——由工棚改建的一间平房接待我的，它是那样的窄小，由于阴暗，白天有时也要开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先生的慈祥、热情和睿智照亮了我的心扉。从他的住房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从此，我和王先生就有了多次的接触。他那宽广的胸怀、对学问的执著和对后学的爱护，使我深受感染。

我们见面谈论的惟一主题是学问。先生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和见解供研讨。面对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先生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循循善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话是：“李先生，这个问题你是怎样看的？”“李先生，这个问题，谈谈你的看法吧！”完全是平等讨论的态度。对我提出的不同意见，先生不以为忤，反而乐意听取和切磋，这就提高了我探讨问题、发表意见的兴趣和勇气。那时先生年事已高，又做过直肠癌手术，身体并不好，但谈起学问，兴致就来了，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不敢谈得太久。当我要告辞的时候，先生总是说：“李先生，我们再谈谈！”

1979年，《中国史研究》刊登了我的《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一文，这是我“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送了一份抽印本给王先生，请他

指教。当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有见解，有深度。我已经把它寄给天野（按，天野元之助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知名学者）了，你没有意见吧！接着，又向我谈起天野对中国经济史和农业史的研究。末了，从书架上拿出天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殷周之部》给我，说：“你拿去看吧。”他没有说借，也没有说送，这本书现在还在我的手头，成了我永远保存的纪念品。看来，王先生当时有意把我推荐给日本学界。先生对后学的奖掖和对我的关爱，于此可见一斑。

我和先生应该说是相当投缘的。我把王先生当作我的老师，王先生实际上已经把我当作他的学生了。

我是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所工作的，这意味着我将要从事农业史的研究。离校前拜访梁方仲先生，他要我向万国鼎先生请教，并随手写了一封介绍信。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又是劳动实习，又是社教、又是“文革”；梁方仲和万国鼎先生也相继过世。直至70年代末，才重新抓业务，进入农史界的圈子。当我最需要指导的时候，天授我良师，这就是王毓瑚先生和游修龄先生。我与王毓瑚先生的接触比与游修龄先生的接触稍早，由于同在北京，当面请益的机会也较多。当我最需要王先生的提携的时候，王先生却离我们而去了。这不但是农史界的巨大损失，对我个人也是重大的损失。

二

我在和王毓瑚先生的接触中，总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风格，与农史界其他前辈和学者不大一样。这种气质和风格，似乎可以用“高明独断、恢宏大度”来概括。

“高明”是相对于“沉潜”而言的，《尚书·洪范》首先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其中有“沉潜刚克，高明柔克”的说法，是讲对下层庶民（“沉潜”）和上层贵族（“高明”）分别采取或镇压（“刚克”）或怀柔（“柔克”）的不同统治方术。清代章学诚借用它指称两类不同风格的学术流派。他说：“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这种划分大体符合学术史的实际，故常常被人们引用。章学诚认为这两种学派无高下之分，应该相互补充和推进，可收“相需之益”，如果相互隔绝和攻讦，则有“两伤之弊”，这是他的高明处。但他强调的是两者的区分，却容易导致绝对化。其实，“高明”和“沉潜”也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的学术造诣和研究手段，是能够不同程度地

在一个学派和一个学人身上统一起来的。

王毓瑚先生就是把“高明独断之学”和“沉潜考索之功”结合起来的。他十分重视作为学术研究基础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抗日战争在重庆编译局工作期间，王毓瑚先生与傅筑夫、史念海两先生合作，从事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这在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以个人之力收集整理中国畜牧史资料，初步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众所周知，王毓瑚先生的突出贡献之一是对祖国农业遗产的整理，他不但为编写《中国农学书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部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农书和古农学不可须臾或离的工具，而且亲自动手整理和校点了一批重要农书。他也重视对古文献的考证和解读，《王毓瑚论文集》中保存了他考释《吕氏春秋》、《汜胜之书》、《管子·地员篇》、《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等重要古籍的心得和成果。尽管如此，从王毓瑚先生总的学术倾向看，并不属于“沉潜”派，而是属于“高明”派。

何谓“高明独断”？有人解释为独立思考或史识，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不全面。清人把“高明”和“精明”作了区分：站在楼上看得远，站在山顶视野宽，这是“高明”；用尺量，用秤称，弄得很精确，这是“精明”。“考索”并非没有史识，“精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史识”，但不同于“高明”，“高明”的史识是高瞻远瞩获得的通识。“高明”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处着眼。即章氏所说的“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

视野宽阔和抓大捐细正是王毓瑚先生做学问的特点，也是他典型的“高明”派学术风格的体现。

王先生非常重视“通”。他晚年计划撰写农业史论丛，就是在长期钻研史料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中国农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贯通的研究。保留在《王毓瑚论文集》中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农作物、农具、土地利用、水的问题和农业区扩展的通论性文章，就是这一计划的部分成果，可惜的是尚未最终完成。王先生的研究从不停止在静态的描述，总是从动态揭示事物发展的基本脉络，而且是指向现实的。读先生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是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的，体现了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提供借鉴的明确意图。王先生的研究又从不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总是联系到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一文，王先生首先分析了中国历史上“水”的条件，指出其中有许多不利因素，中国农民是在与水的条件进行艰苦斗争中走过来的。他把水利和水害联系起来考察，指出“除水害第一，兴水利第二”的逻辑关系，从而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水利事业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接着，王先生又考察了战国以后形成的专制政权和土地私有制与治水活动的关

系，阐述了官府治水与民间治水的不同实况，力图对其功过利弊进行辩证的分析，避免片面性。可见，王先生的这些论述与一般的水利史研究是多么的不同，它显然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为全面和更为真实的历史画面。不但通论性研究如此，断代的个案研究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如《近代后套开垦试论》，不但简要而清晰地介绍了后套的地理环境，近代后套开垦的背景、缘起、进程，开渠与垦田的关系，开垦活动的组织和“资本积累”方式，而且分析了“地商”（开垦活动的“组织者”）和农民（作为开垦主力的内地移民）、“地商”和官府的关系。最后指出后套的开垦活动移植了内地单打一的农耕方式，未能融合和改造当地原有的原始游牧方式，实现新的农牧结合，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一论述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给人们展示了立体的、动态的、活生生的历史。还应该指出的是，王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但对历史地理有很深的造诣，这使得他能够驾轻就熟地把历史的基本要素——时、地、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上所说的“通”已经包括了“直通”和“横通”。但王先生的“横通”不止于此，它还包括了中外比较和世界眼光。这当然与王先生在德国和法国八年的游学经历有关。先生熟悉西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他首倡比较农史研究，主张把中国农业史放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考察，主张把中国史和外国史视为一个整体；他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奠基的工作。如果天假以年，一定会结出硕果。虽然先生壮志未酬，但从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著中仍然可以发现他的世界眼光，处处进行中外的比较。例如，关于“水”的问题，先生拿中国历史上“水”的条件与古代埃及、印度比较，分析两者的不同，指出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生搬硬套到中国历史上来，批评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完整的灌溉系统、中国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形成是由于兴建灌溉系统的需要的观点。王先生又指出，以内地移民为主力的后套开垦带有“殖民地”性质，但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具有不同的性质。王毓瑚先生又写过《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一文，把战国秦汉社会与西欧夺取政权时期的社会相比较，认为两者存在不少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和观念，均以逐利为最高原则，但战国秦汉的逐利主要是商业活动，工商业者各级依附于政权，始终未能发展为西欧近代的那种资产阶级；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史应该探讨的主要问题。文章纵论古今中外，汪洋恣肆，写得很大气。王先生曾把文稿给我看，要我提意见，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回信中写了“这篇文章对于用教条主义态度研究历史的人，亦可以震聋发聩”这样的话。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

总之，王先生的学术视野可以用“天人古今”（“天”指自然，“人”指社